

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

劉曙光

數智時代的高質量發展，無疑是關乎國家發展大勢，關乎中華民族共同體每個成員前途命運，關乎國家整體利益、根本命運、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和關鍵事務，即“國之大者”。而新質生產力，特別是其中的科技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或者說高質量發展的引擎，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理所當然成為各行各業研究的重點領域。學術期刊行業也不例外，更不能置身時代之外，而是要置於時代科技革命的大潮之中，抓住難得發展機遇，從容應對挑戰。

每一歷史時代的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把握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歷史辯證法，有助於把握歷史大勢、着眼長遠、增強歷史主動精神，以深切的家國情懷、強烈的責任擔當、形成共識後凝聚的磅礴合力，更好地發揮主體性、能動性、創造性，利用時代所提供的技術手段和內容材料，進一步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從整體上推動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

一、數智時代、新質生產力與“交錯帶”

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辯證法的角度來解讀數智時代、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等概念。

“農耕區與畜牧區是依人類經濟生活方式而劃分的基本區域，介於兩者之間的則為農牧交錯帶……”自然帶邊緣交錯地帶較為敏感，當環境出現波動時，它們會最先發生改變，進而推動整個地區產生變化。其實，歷史發展、社會變遷、文化傳承、科技創新乃至生活中的問題解決，都有類似的“交錯帶”。（《語文教學之友》，2025 年第 5 期封底）

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時代、數智時代等都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交錯帶”。只是這裡的“交錯帶”不是一個“空間”概念，而是一個“時間”概念。即我們常講的“歷史轉折時期”、“社會轉型時期”、“科技的更迭期”。“交錯帶”強調的是社會各系統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和相互關係，特別是“時代”與“時代”的“交錯帶”更呈現出複雜性、豐富性、互容性、不確定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點。通過“交錯”，不同時代的文化、技術、資源和觀念相互影響、融合，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這裡不僅有量變、量的積累、局部質變、質的飛躍即質量互變規律發生作用，更有傳統與現代、人與機器、科技與人文、守正與創新、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對立統一。社會歷史正是在這樣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過程中不斷進步。

對立統一，就是承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列寧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要認識‘自己運動’中、自生發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過程，就是要把這些過程當作對立面的統一來認識”（《列寧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57 頁）。數智時代、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是對立統一的。統一體現在它們之間具有一致性、互動性和共生性，對立則體現為國家與國家、傳統與現代、分散與協同、個別與一般、局部與整體、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現象與本質、多元價值觀等的矛盾。

何謂“數智時代”？一般是指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數據”與“智能”深度融合驅動的新型時代形態。它並非獨立於互聯網、數字化時代的全新階段，而是在數字化基礎上，通過人工智能等智能技術對數據價值的深度挖掘和應用，實現社會、經濟、生活等各領域智能化升級的新階段。數智時代的性質、特點可以概括為：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以智能技術為關鍵驅動力，賦能各行各業。數智時代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升級，更是對生產關係、社會規則的重構。

“新質生產力”是當前的熱詞，它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力，是以數字化、智能化等關鍵性顛覆性新興技術突破為基礎，伴隨着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速崛起而呈現的生產力發展新質態。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在文化領域也不斷催生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深刻重塑媒體形態、輿論生態和文化業態，帶給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整個出版行業全方位的技术賦能，推動出版行業走上了“新賽道”，給學術期刊及其編輯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數智時代有一個不斷形成、發展、展開的過程，數據與智能的融合也是一個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過程。毫無疑問，我們還處於數智時代的初級階段，其高級階段還遠未到來。對數智時代，我們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得多。我們的認識也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很多理論和實踐問題不可能一次性、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也不可能安逸地在前人栽種的大樹底下乘涼，而是要不斷地結合時代為這棵大樹提供營養，對前人的研究不斷地反思、修正。

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是最新銳、最強勢的出版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內在地包含了更高素質的勞動者，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更廣範圍的勞動對象，以及三者的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隨着數智時代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學術期刊的發展不斷更新迭代，現在似乎又進入一個新的“過渡時代”或“轉型時期”，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二、數智時代的歷史辯證法

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辯證法。歷史辯證法的核心內容，就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規律。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社會形態理論、世界歷史理論、大歷史觀則是確立歷史時代的科學理論基礎。觀察、認識中國與世界，制訂相應路線、方針、政策，包括對數智時代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分析思考，都應以歷史辯證法作為理論基礎，需要有歷史感、系統性思維、整體性思維、過程性思維。

數智時代摧毀一個舊世界，同時創造一個新世界。一個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主要取決於該時代的性質、特點、社會發展程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需要。談論數智時代一個行業的未來發展，首先應當正確認識該時代發生的新變化、新特點，特別是佔主導地位的技術手段，以大歷史觀（長時段視角、全球視野、系統思維），從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中把握其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基本潮流，而不能就學術期刊談學術期刊，就出版行業談出版行業。否則，就可能被個別的、局部的、有時前進有時後退的運動所迷惑，迷失方向甚至作出錯誤決策。例如，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劃分，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等等。

人類社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巨大系統，這個系統中有無限多個因素在交互作用。這些因素中，既有生產力，又有生產關係；既有經濟基礎，又有上層建築；既有客體方面的因素，又有主體方面的因素，等等。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出種種難以預料的隨機性、偶然性，但社會歷史的發展並不是雜亂無章、毫無規律的，其中，作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具體和歷史對立統一的生產方式，制約着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作為一種總的趨勢的歷史必然性（規律）就在

這些隨機性、偶然性中跳躍，時隱時現。社會歷史是各種合力作用的結果。必然性的東西並不能完全決定個別的歷史事件，它只能規定歷史發展的大致範圍和一般趨勢。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在於“規律能彌補這個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現象的總和”（《列寧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8 頁）。正是這種“個別向一般的轉變，偶然向必然的轉變，對立面的過渡、轉化、相互聯繫”，使得社會歷史呈現出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面貌。

數智時代的規律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技術與經濟、社會、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技術是將科學知識付諸應用、保護與改造自然、造福人類的創新實踐，是生產力發展最重要的因素。當前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往往就是科技主導權的爭奪。中美兩大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詮釋了當下這個充滿關稅壁壘和技術限制的時代。這場競爭的結果無疑將重塑 21 世紀全球舞台上的權力格局。在中國，科技已融入日常生活。中國已在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甚至有一個術語來概括這一切——‘新質生產力’，既呼應了馬克思主義，又展望了技術夢想的未來。”（吉列爾莫·阿夫里爾：《技術創新助力中國提升影響力》，《參考消息》，2025 年 7 月 8 日）

數智時代的到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現象遠比規律豐富。“鐵的必然性”與無數偶然的因素糾結在一起，是在偶然性中實現的，新質生產力的實現不會自然而然、一蹴而就，而是要通過主體的艱苦奮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11 頁）。數據與智能的融合、新質生產力由弱到強，都具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由肯定到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並不是毫無作為，而是要把握歷史大勢，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大有可為。

從總體的歷史發展來看，隨着歷史時代和生產力水平的迭代更新，學術期刊將不斷變換其內容和形式，內容和形式的對立統一表現為“內容對形式以及形式對內容的鬥爭”。從紙質版到電子版、音視頻，學術期刊的發展更多的是“拋棄形式，改造內容”。

三、新質生產力給學術期刊帶來的革命性變革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0 頁）毫無疑問，新質生產力，特別是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提高了全民族的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社會分工的規模化、一體化程度，也給學術期刊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新質生產力的“新”，在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生產關係中體現出來。

第一，對主體繁瑣的編輯事務工作的解放，創造編輯“新”人（能力和素質提升），促進編輯和學者雙向互動。“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 頁）AI 創造了懂得 AI 的期刊編輯，對 AI 的使用則不斷提升編輯的素質。人工智能幫助期刊編輯完成文獻檢索、審稿、校對、稿件加工，監控出版流程，處理編輯部繁雜事務，提高工作效率，縮短出版周期。在生產力系統中，人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中，主編、編輯、編委、合作伙伴的素質和資源決定期刊的資源和品牌。人工智能賦能和新質生產力發展，

在某種程度上雖然是對傳統出版業的否定和“反動”，但期刊編輯必須意識到，融合出版不是削弱編輯傳統出版能力，相反，是要全面提升傳統編輯的素養和能力。因為它給期刊編輯創造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給編輯創造了可以獲得自由發展的時間。

第二，推動學術期刊轉型升級，使之成為知識生產的組織者、服務者、引領者。科研模式、科研範式、知識生產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數據驅動、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工具廣泛用於科研；論文選題由以往的單一學科走向跨學科和交叉融合，學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推動科技人文的一體化；欄目設置由以學科為單元變成以問題為中心；來稿由紙質投稿、郵箱投稿轉向數據採編平台或投審稿系統，由全、小、散、弱走向特色化、專題化、品牌化，打造核心競爭力；稿件的組織形式，由被動的來什麼稿用什麼稿，轉向年度選題策劃會、主持人制度、與學科學院學術團體聯動互動、主辦青年學者論壇、專題策劃、筆談等；由不關注現實的象牙之塔轉向關注國計民生、作為智庫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由大數據分析走向挖掘學術趨勢，遴選優質稿件、優質作者；編輯校對由單純人工校對轉向多種軟件智能校對；出版形式多樣化，由傳統出版走向融合出版，如，設計精美的封面和版式、手機自適應終端閱讀、電子期刊書架、微信公眾號推送、領域專家學者精準推送（知識服務）、短視頻、多語種出版、長英文摘要、預印本、網絡首發、增強出版、加入國際數據庫等。

第三，促進了行業標準和評價標準的與時俱進、更新迭代。數智時代，學術期刊的產品主要不再是紙質版，與之相適應，編排規範、摘要編寫規則、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等發生了重大變化，評價標準也不再只是紙質發行量的大小、轉載量，而是閱讀量、下載量、影響因子、社交媒體粉絲數，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準確了解學術期刊的質量、影響力。當前的評價體系是推進學術進步還是抑制了學術發展？這本身就需要評價機構之外的學術共同體進行調研和評價。推進了治理能力的提升，包括對評價及其指標體系進行反思、治理和重構，使之更趨科學、合理，涵養良好學術生態。當然，還會有更多的行業標準陸續出台。如今年7月3日，由全國新聞出版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辦的新聞出版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範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標注與聲明》研製工作啟動會在北京召開。

第四，各種平台的宣傳傳播越來越注重可聽化、可視化、國際化，促進了知識共享和文化傳播，中外文化高頻互動、高度互聯，帶來世界性的深化和民族性的強化。學術期刊“內容為王”固然重要，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通過人工智能對論文的加工處理和翻譯，有助於國際國內數據庫的收錄，有助於全渠道、全方位宣傳傳播，提升傳播力、影響力、美譽度，促進學術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鑒。即使是學術性非常強的文章，也可以通過加工改寫，變成可聽化、可視化的“新聞”、短視頻、學術直播，推廣其新突破、新發現、社會價值。

第五，更充分發揮學術期刊的服務功能，或許使之成為知識服務商。關注現實和更為廣泛的傳播，使得期刊更好提供決策諮詢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服務“雙一流”大學建設，服務學科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內容定制化推送服務，提升了讀者的滿意度；學術社交功能強化，為作者服務，更好提供一對一論文指導，等等。

第六，促進了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分工，推動了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規模化。馬克思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頁）作為“新質”生產力，必然促進全民族的分工向規模化、集約化、一體化方向發展，彼此協作程度更高。至於出版行業，也必然如此。所謂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術期刊、學術期刊與其他學術機構

(學院、研究所、出版社等)聯合起來,通過要素整合、規模擴大、技術革新、資源共享、分工協作,作為一個整體運行,獲得集群優勢,從而達到節省精神生產成本,提高辦刊效率,擴大核心競爭力的目的,使各自獲得更充分的發展,更大程度地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業已出現的期刊出版社模式(期刊與出版社整合)、期刊社模式(多個期刊整合成立期刊社)、期刊研究院模式(期刊和科研院所整合),就是如此。毋庸諱言,當前相當多的期刊出版資源分散、力量微弱、集成度不高、內容交叉重複,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化運作,在與知識資源平台、與國際機構合作過程中,難以形成走出去的合力,難免處於弱勢地位。學術期刊的集群化、集團化,實質上就是生產關係的變革、體制機制的改革,提高了協同發展能力,就是新質生產力。

第七,學術共同體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優化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推動學術繁榮發展。學術期刊、作者、研究機構(院、系、所、中心)、知識資源平台、管理機構、評價機構、社會團體等緊密合作、資源共享、民主協商、深度互動、命運與共,構成協同創新的學術共同體,培育和扶持學術創新人才。共同體本身就是偉大的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說,調整學術共同體不同主體之間的生產和合作關係,就是發展新質生產力。

當然,數智時代還只是處於初級階段,並沒有把它的本質全部展現出來,本質的展現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上述變革也還只是從理論層面的分析,可能還是一種理想狀態,而並不是已經完成了的現實。

四、AI 對於學術期刊是把雙刃劍

事情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數智時代在給學術期刊帶來快捷便利的同時,也會產生同樣多的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給主體(期刊編輯、作者和讀者)帶來心理生理和智力某些方面的傷害。數智時代的閱讀帶有碎片化、大眾化、娛樂化、低價值、膚淺化特點,使人的紙質版閱讀和高品位學術理論閱讀的時間減少、深度閱讀能力和記憶力退化、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弱化、持續注意力下降;AI 寫作帶有創造性局限、邏輯與事實風險、倫理和版權問題、情感溫度缺失、參考文獻虛假性,這對於主體的邏輯性、系統性、心理生理健康是有害的。

(二)AI 帶來的法律、倫理及學術規範問題。科研中允許使用 AI 或許是一個必然趨勢,但 AI 降低了學術創作的門檻,使得論文質量良莠不齊,在實現技術賦能的同時又如何保持學術的尊嚴?學者利用 AI 寫作,學術期刊是否認可?允許作者使用 AI 創作的比例如何確定?又如何鑒別 AI 造成的學術不端?AI 驅動變革伴隨倫理風險,AI 生成的內容可能是虛構的,造成真實性危機;也可能污染學術生態,學術期刊如何建立技術倫理審查機制?AI 的數據收集、採集,可能洩漏個人信息、個人隱私;AI 生成內容很可能產生侵權和傷害,那麼責任主體如何界定,如何保護作者和出版單位的權利?如何對上述問題進行立法和規範,或許真的是任重而道遠。

(三)使傳統出版走向式微。由於融合出版的興起,傳統出版業萎縮或改變原有形式。紙質版將不會是閱讀的主要形式,但不會消失。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高級階段重複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徵、特性等等,並且仿佛是向舊東西的復歸”即否定之否定。紙質版的功能將走向收藏、把玩、版本研究、審美等,印製可能會更加精緻。

(四)評價體制過分重視國外知名數據庫收錄、影響因子高低,重數量輕質量,以刊評文,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名單固化,不合理不科學指標體系亟待改進。由於受到出版平台、評價體系、期

刊管理體制和品牌影響力等因素影響,學術期刊,特別是中文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小,優質稿源外流,總體大而不強。如,最具國際影響力期刊的遴選,實際上只是計算期刊的國外影響力。應建構鼓勵探索、寬容失敗、尊重原創的科研氛圍和學術評價體系,進一步利用國際出版平台、提高國際傳播力,鼓勵科研工作者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五)學術期刊與知識資源平台的共生關係發生變化。學術期刊在平台的呈現碎片化,不見森林只見樹木,不見整刊只見單篇。一方面,學術期刊與平台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平台投審稿系統的開發,查重,檢索摘要功能,使得學術期刊需要向平台付費。另一方面,學術期刊與平台的利益衝突越來越大。學術期刊製作網站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數據更新不及時,訪問學術期刊網站的數量越來越少,幾乎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越來越依附平台,而平台通過知識付費和版權運營來盈利,越來越無償地佔有學術期刊的內容價值。

小 結

數智時代,在學術期刊發展中,機器人會承擔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工作,諸如寫作、審稿、校對、潤色、加工等,也帶給我們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人一機關係、編輯的本質、未來是否還需要編輯等。身處時代的“交錯帶”,我們的認識難免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們的認識必然是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人的認識不是直線……而是無限地近似於一串圓圈、近似於螺旋的曲線。這一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獨立的完整的直線,而這條直線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裡去。”(《列寧選集》第2卷,第560頁)作為學術期刊編輯,我想有幾點認識必須堅持:

第一,AI在學術期刊中的使用是必然趨勢,對技術賦能應持開放態度,不能因循守舊和墨守成規,不能禁止新技術的開發利用。隨着AI的迭代更新,其對傳統出版秩序產生的衝擊越來越深刻,也將越來越多地介入學術生產和學術評價,這是歷史潮流。我們應培養使用AI的能力,AI雖不能成為獨立責任主體但它是強大的輔助工具。第二,積極探索和創新,提高對AI負向效應的治理能力。AI寫作的界限在哪裡?如何提升治理能力?人一機對話與人一機關係,將會引發更多關於人體哲學和人的哲學思考。通過人一機對話和互動,人是“新”人,會更聰明;機是“新”機,會更智能。時代提出的問題,時代總會解答。第三,不斷反思和修正對數智時代的已有認識。人工智能作為工具,不具備人類的思想、情感、想象、智慧、審美和創新能力。技術不是萬能的,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具有創新性的複合型編輯人才,人的主體性是不可替代的。

發展就是機遇與挑戰的對立統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行業要想贏得歷史主動,就要審時度勢、未雨綢繆,善於抓住機遇、從容應對挑戰。所謂機遇,也就是歷史與現實、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在錯綜複雜的矛盾運動中所形成的一種最佳狀態。抓住機遇,往往就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學術期刊和出版行業也是如此。

作者簡介:劉曙光,《北京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教授。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劉澤生]